

青萍之末

1982 年的一个星期六的午后，四周静悄悄。随着木楼梯上一阵“咚咚”声，一张我正盼望着的圆圆的脸出现在眼前。

“爸爸!”不像是单纯地“打招呼”。果然，女儿立刻吐出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他要同我交朋友。”

他? 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深深的眼窝,蓝蓝的眼睛,金黄卷曲的头发,潇洒的神态,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他是托马斯·约翰逊先生,美国青年,博士研究生,到中国的一所大学进修汉学,同时被安排到女儿所在班级教授“美式英语”口语课,所以他是女儿的老师。

我曾经遭遇过尴尬。去年,也是星期六,女儿一回家就说:“爸爸,明天我请约翰逊老师到家里吃饭。”“怎么?事先不商量一下?”我陷入困境。1981 年,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开放呢,但已经发出的邀请无法取消。请太太准备待客的饭菜,好办。可是,外国男老师到中国女学生家里来,不是“家访”,而是“来吃饭”,左邻右舍会怎么想?“上头”又会怎么看?必须向领导通气。于是,我连夜拜访供职学校的支部书记报告情由。书记很传统,还有些严厉,但这回很通情达理,说:“外国老师到学生家里吃顿便饭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要有什么顾虑。”请得了“尚方宝剑”,第二天我得以安心地举行了“破天荒”的“涉外”家宴,不必担心有人反映上去而背上包袱了。

而现在,这对青年男女从产生好感到发生感情到最后要结为终身伴侣了,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甜蜜链条,我必须面对。约摸半分钟,难堪的寂静被打破。我一字一板地说:“根据我国的婚姻法,父母不得干涉子女的婚姻自由。你已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涉及感情问题,就应听其自然发展,不可怀着什么目的刻意追求。”女儿对这样的“官样答复”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这以后,约翰逊先生常常会

在周末来家里做客。

跨国婚姻在如今已是寻常之事,可女儿的跨国姻缘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这就演变成颇不寻常的一场风雨……

跨国姻缘的风风雨雨

◆ 许传铭

风起雷动

期盼是最令人心焦的。阿缓和汤姆确定星期一分别向阿缓班级的指导员老师和学校外事办公室公开两人的恋爱关系,同时提出要求结婚的申请。结果将会怎样?那时家庭电话还是稀有事物,所以我们整整 5 天得不到任何消息,急死人! 直到星期六午后,随着木楼梯上“噔噔噔”一阵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跟进阿缓挂满霜雪的脸和

一串晴天霹雳。

“不得了,不得了,我的事通天了,当天就报到团市委,又立即转报团中央。”女儿像一艘从暴风雨中颠簸着驶回港湾的船舶,有一肚子委屈和不平要倾泻。“校园就像‘原子弹爆炸’,大字报铺天盖地,说什么有些人不要‘贫穷的妈妈’,为了出国‘不顾人格国格’,明明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

大事不好! 曾经的美好希冀化为泡影,曾经的担心不但成为严酷的事实,而且百倍超出我们最坏的思想准备!

“慢慢说,慢慢说。大字报归大字报,校方的态度呢?”我赶紧缓和气氛,尽量抑制内心的焦虑。

“大字报就是有组织的! 官方的态度倒是四平八稳。汤姆的未婚证明等证件齐全,校外办当即给他开出了申请结婚的介绍信。至于我,他们说,要是退了学而申请结婚不被批准,那岂不真的要做‘社会青年’了?顿时,我不但紧张而且陷入恐怖!

阿缓看到我脸红气促的样子,连忙安慰我:“爸,别急,当心血压。也有不同声音的大字报,认为青年人的感情问题,不能同政治扯在一起,更不可以无根无据扣帽子。持这种观点的大字报数量虽少,但他们是自发的,代表着真诚,代表着真实,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我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动摇。我会坚持到底。爸不要担心,特别是别让妈害怕。”

破釜沉舟

锣鼓越敲越紧。很快学校的系主任来访。这是一位 50 多岁的学者,头发微秃,带着金丝边眼镜;随同的是一位年轻女干部。主任笑咪咪的,很客气:“怎么样?为许缓的事伤脑筋吧?”随随便便的语气,使气氛轻松不少。主任接着恳切地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最好不要让人才流失到国外去;再者,听说你们在那里无一亲朋,唯一的一个女儿远去美国,放心得下吗?所以还是要慎重考虑呀。”一席话,既着眼国家全局,又关怀到我们的

小家,真是大道理、小道理,句句在理。可是,阿缓、汤姆的感情呢?他们的婚事呢?我谨慎地回答:“主任说得对,我们会郑重考虑。不过,阿缓和汤姆的终身大事,也不是我们家长决定得了的……”客客气气送走主任,未能减轻我们的焦虑,但同时又很感谢两位来访者,感谢他们为我们做了义务辟谣人。阿缓告诉过我们,学校里传遍“许缓家全部‘美式装备’了”:现在两位亲眼目睹,我家只有搁在被褥上的一架老掉牙的收音机而已。

如果说,校园大字报至少从表面看只是“民间舆论”,那么系主任的劝说可是明明白白的官方信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后更大的风浪来了。5 月初,本地的三大报连续发表两篇几名共青团员向党汇报思想的文章,内容无非是校园大字报的精致版,只是现在已经从局部舆论升级为地方舆论,官方的气息更强烈了。另一方面,校园里也特别闹猛,举行爱国主义教育报告会的时候,阿缓、汤姆并排坐在一起听讲,录像机“丝丝”瞄准他们拍,大有“录以备考”之意。汤姆看不懂了,为什么涉及两个人感情的事,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但他懂得“入乡随俗”的道理,虽然满腹疑虑,却始终缄默不语,照样读他的书教他的课,只是人们发现他一改平日的轻松活跃,变得寡言少语起来。

现在,只有学校行政方面仍然给阿缓留着

一条活路——退学,到街道组织开申请结婚的介绍信。是的,学非退不可,这是先决条件,也是必要程序。在采取这一果断行动以前,我们同女儿再次郑重恳谈。

妈妈说:“阿缓呀,你想想清楚,汤姆这人到底靠得住吗?万一你被抛弃了,怎么办呢?”

阿缓平静地回答:“汤姆是真心的,我没有怀疑,爸爸妈妈可以放心。”对于“被抛弃”的顾虑,阿缓有异议,“不存在‘被抛弃’。抛弃是双向的,抛弃别人,也就是被别人抛弃。顶多是离婚;即使如此,也不是失面子的事,现在国内离婚的事也并不少见。何况我坚信这样的事决不会发生。”

做娘的还是放心不下,眼圈有点红:“万一呢?万一真的分开了,你在那边无亲无眷,怎么活呀?再说,我只有你一个女儿,也舍不得你到大老远的地方去。”

“爸妈别伤心,走得再远,我也不会忘了我们这个艰难困苦的家,我心的一半永远留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永远在爸妈身边,永远同两个哥哥在一起。”阿缓说得又伤感,又激动。

阿缓的坚定执著,和随后发生的两件事终于促使我们破釜沉舟。就在校园以及本城为阿缓的事沸沸扬扬的时候,《人民日报》派了两位记者前来调查,结论是“爱国主义的教育是要进行的,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也是正常的”,这就否定了大字报和报刊相关文章的种种不实之词;既然如此,也就没有理由阻止他们的婚姻。同时,在遭遇重重压力的时候,汤姆家里两次急电,先是母亲病危,接着母亲病故。面对两难选择,汤姆愁容满面,耸耸肩,摊摊手,含泪说:“我真想飞回去,我应当赶回去,可我不能回去。我不能走,我走了,这里怎么办呢?我会打电报向家里说明情况,相信我的爸爸和兄弟姐妹会同情谅解支持我的。”权威报纸的调查结论和汤姆对爱情的忠诚坚定,极大地鼓起我们走“华山一条路”的勇气,于是果断决定让阿缓到学校办理退学手续。

吉凶未卜

退学申请正式递了上去,为了一个学生的退学,学校召开了一次特别校长会议,结果准予退学。那天,阿缓掂起铺盖,怀着恋恋不舍和遗憾告别校园回家。老师和几个同学一直送到大门口,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一切手续和证明材料齐全,到市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但转眼到了暑期,仍未批准下来。汤姆常常到家里来,有时会呆一整天,吃了晚饭再回学校。左邻右舍渐渐同汤姆熟起来,有人同他下中国象棋,有人会逗他:“你怎么来抢我们中国姑娘呀?”大热天的下午,汤姆会在公用自来水龙头旁纳凉,赤裸着白晢健壮的上半身,穿着短裤,端起满满一面盆水,“哗”地从天顶浇下去,一旁的人们嘻嘻哈哈看“西洋镜”。

在同汤姆一起等待民政局通知的日子里,耳边常响起准洋女婿有点洋里洋气的“爸、妈”的亲热呼唤。这个洋小伙子很容易接待,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也不喝中国茶,只喝凉白开。膳食也很随便,一盘洋葱炒牛肉丝,几碟蔬菜,一碗并不道地的罗宋汤,有时外加一个咸鸭蛋,他就吃得津津有味。

一天,汤姆和我们一起吃过晚饭,正打算回学校去,忽然滂沱大雨下个不停,眼看到了半夜。本来,小小一间屋,住两代 4 口人,临时加一个地铺,绝不可能发生什么故事,可就怕有“还没有成婚呢,就留在家里过夜了”之类的闲言碎语,那时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只好狠狠心让他冒雨骑车走人,结果他浑身湿透,淋出一场高烧。人言可畏呀!无风都可以起浪,如被从豆腐里挑出骨头的影子,那还不是会招来淹死人的唾沫吗?

民政局的通知久久未来,终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于是跑去问,却三番四复,只给你简简单单三个字“等通知”,这使我们深感忧虑。一天傍晚,我校的一位领导突然来访,他只站在我家门口传达:“许老师,市府为了你女儿的事找你谈话,请你约时间,定地点。”

就在门口送走传话人,我独自发呆,反反复复默念:市府找我谈话,是凶是吉呢? 决定暂时对家人“保密”,一个人发愁总比大家一起发愁好。

雨过天晴

没想到,那天上午我在单位办公室见到的,竟是政府某部门派来的两位吉祥使者。几句开场白以后,其中一位同志恳切地说:“请许老师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认为许老师女儿同美国留学生交朋友有什么不对,而是想了解情况,必要时愿意提供帮助。”此话一出,云开日出,从此一路坦途,一切法定手续迅速办妥。1982 年圣诞前夕,女儿同汤姆在国际礼拜堂完成婚礼,然后双双飞美。举行婚礼的时候,市府和女儿大学母校的外事部门还派员观礼并参加了婚宴。

女儿的涉外婚姻历经曲折,但结果顺利圆满,婚后生活和谐幸福。他们两人到达美国以后,汤姆继续休学,打工支持女儿重读大学;女儿获数学、电脑双学士学位就业以后,回过头来支持汤姆修完学业获博士学位,随即应聘于某大学,后任教授。有了宝贝儿子以后,为了管带好孩子,女儿辞职做了全职主妇。

我们宝贝的外孙很可爱,很聪慧,很善良。这是个典型的亚裔混血儿,深陷的眼窝和挺直的鼻梁像爹,乌黑的头发和眼珠像娘。现在他已是翩翩少年,勤奋好学,学业优秀,特爱数理。他自幼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卓有成就,现为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和独奏钢琴手之一。

女儿远去天边 28 年,拳拳之心,时刻牵挂着我们。还在汤姆打工支持女儿读大学的时候,他们自己节衣缩食,给我们买了外汇商品房,并时刻不忘关心我们的健康。女儿也没忘记大哥在“一片红”中插队黑龙江 10 年的艰辛,当大哥准备赴美自费留学的时候,女儿特地给美国领事馆写信,费述大哥的艰苦经历和他自强不息争取上进的精神,领馆大受感动,在全馆传阅,结果签证一次成功。随后大嫂伴读,签证也顺利通过。我们的大儿子阿兴在美获教育学硕士后,在一所大学任教,现为教授。

女儿的跨国姻缘发生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一场风风雨雨之后,是美丽彩虹的显现——就像这些年从风雨中一路走来,绽放绚烂光彩的祖国!

(编者注:文中人均为化名)

悬空的心

终于,那天在我家一间 20 平方米左右的后厢房,演出了电影中的一幕:太太和女儿端坐靠北墙的小床边,眼睛里闪烁着不安。约翰逊神情局促不安,下意识地搓着手掌开口了。他原本相当流利的汉语,有些结巴:“我、我同阿缓有了感情,已经向她求婚,现在请求两位家长的同意。”小伙子完全按照中国的传统和方式说出了这些话。我们早已知道洋小伙子会说什么,因为女儿同我们通过气;所以我的应答早已准备好了。我吸一口气,吐出在心里酝酿了多少遍的话:“约翰逊先生对我们的女儿有好感,我们感到很高兴。在我国,跨国婚姻是一件严重的事,所以我们还要商量商量。”不无歉意地送别了托马斯,我内心也忐忑不安。

当天晚上,在郊县教书的大儿子匆匆赶到。在 25 支光白炽灯昏暗的光线下,5 个成员的“家庭全会”开幕。会议持续到将近半夜。大家都顾虑重重,尤其是太太,“我们本来‘干干净净’,有了海外关系,以后会不会带高帽子游街?”“阿缓丢掉工钏读大学,假如婚事不成功,会不会丢掉学籍做‘社会青年’?”这确实是性命交关的问题。经过反反复复的你问我答,大儿子阿兴谨慎发言:“好像不必顾虑太多。历史螺旋形上升,不会简单重复。”小儿子阿明朝他白眼:“什么‘螺丝’不‘螺丝’?大学生不要文约约,说明白点。”我接过话头:“阿兴说得对。许多事实说明,社会已转了个大弯,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这方面的顾虑应当消除。”思想很快获得统一。我最后说出留有余地的话:“前景如何,到底不是我们说了算。假如阿缓真的丢掉学籍,做社会青年,我们全家要为她负起责任来。”托大哥北疆插队的福,进厂做了工人的阿明拍拍胸:“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阿缓自始至终没有发言。“全会”在较为轻松、满怀希望和信心的气氛中“闭幕”,最后决定让阿缓邀请汤姆第二天晚上到我家吃馄饨,那时我们将郑重告知他我们讨论的结果,给他一个期待的喜悦。

从那时起,我们缩短了与约翰逊先生的距离,亲切地叫他“汤姆”。但毫无疑问,那个“不确定性”仍把我们的

心悬在了半空,等在我们前面的将是什么?